

论白先勇小说中音乐一空间的社会象征意义

陆正兰

摘要:音乐(歌曲、纯音乐、戏剧音乐)在白先勇小说中是一种“多情境符号”,它们在不同的表意模式下,直接参与了白先勇小说中的社会文化空间建构。空间的品质成为白先勇作品中音乐文本一个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,不考虑空间而分析其中的音乐文本,会剥离音乐原有的文化属性。同样,音乐作为伴随文本,使其笔下的空间具有了鲜明的社会文化识别性。

关键词:白先勇;小说;音乐;空间;符号

在白先勇的小说中,音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远远不止是一种烘托气氛、点明背景的附带描写,而作为一种“多情境符号”,在不同的表意模式下,直接参与了白先勇小说中的社会文化空间建构。在他的小说中,音乐是一种象征,它把历史的时间推衍,变换成了一种社会空间的生成。

从最早的小说集《寂寞的十七岁》中的《我们看菊花去》《黑虹》到《台北人》中的《永远的尹雪艳》《一把青》《游园惊梦》《孤恋花》《花桥荣记》,再到《纽约客》中的《夜曲》《Danny Boy》《Tea for Two》,甚至长篇小说《孽子》等,这些作品中出现大量的音乐元素(歌词、唱词、对音乐的描写、人物对音乐的痴迷等),它们作为白先勇小说的有机成分,参与并构筑了其作品的整体意义。

通常来说,大部分作家习惯于以文字建立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,用音乐作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似乎是音乐家的禀赋,但白先勇的很多作品里,他做到了两者。在小说《游园惊梦》中,作者这样描述:“笛子和洞箫都鸣了起来,笛音如同流水,把靡靡下沉的箫声又托了起来,送进《游园》的《皂罗袍》中去。”这就如同他在一次被采访中,所谈到的昆曲《游园惊梦》中《皂罗袍》的音乐魅力感受相通:“笛子声一出,整个人都坐进去了……”音乐不仅能引领出另一个超越现实的时空,还能建构出一个穿越历史的通道。这既是音乐这种艺术体裁特有的能力,也是白先勇作品鲜明的艺术技巧和魅力。利用小说文本本身的时间-空间变异特点,将音乐作为一种再现方式,建立了小说中的过去与新的时空媒介关系。

音乐本身需要一定的空间才能传播,也必定在某个社会环境和文化空间中被创造、被体验。在白先勇笔下,音乐出现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之中,比如,戏台、舞厅、酒吧等。叙述直接将音乐文本种植到文化空间中去,成为声音

与文化之间的纽带。

音乐与空间之间,有一种在物理上很正常、在文化学上很难分析的特殊关系。音乐必然是绵延的,是时间性的,而空间原本形态是静止的,与时间相对立。然而,音乐与空间结合,也就是两种文本的有机结合,这时注入了音乐的空间就不是一个静态的文本,而是一种文化实践空间。从音乐方面说,一个与音乐结合的自我不可能自我完成,它需要通过音乐这种有效的交流形式,不断与世界、与他人、与社会建立意义联系。而从社会空间来说,也意味着不是人物自我身份建构音乐文本身份,而是音乐的时空流动构筑了人物的命运。这样,似乎随意的音乐,就成了历史的身形,成为追踪人物命运的符号表征,此时音乐在生命经验和社会空间中,作为一个整体环境,犹如“格式塔”的一部分显现出来。

一 音乐作为人物的命运符号表征

维特根斯坦认为:“一个词的使用就是它的意义。”音乐的意义就是它在社会中的运用。这些被作家在不同的表意模式下使用的音乐,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色彩。

白先勇的不少小说直接用音乐名称做标题,音乐就犹如电影的主题旋律,成为叙述中再三回旋的主人公的命运主题。《孤恋花》写一个台北孤儿雏妓娟娟的悲惨命运,娟娟“一副飘落的薄命相”,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本能,任凭嫖客玩弄。她表演的是老乐师林三郎在日据时代写的流行曲,歌本来就凄凄惨惨,娟娟的歌声又是“蛮强的怨情都被唱尽了似的”。最后娟娟杀死了虐待她的嫖客,自己也发了疯,只有几乎眼瞎的老乐师学着她的嗓音唱“青春……变成落叶相思栽”。底层少女,命运如歌,无论哪个时代,似乎都是前世注定的凄凉。这时,歌的内在生命与其命运表征相

互渗透。

小说《一把青》也是一首歌的名字,写的是空军眷属朝不保夕的悲惨命运。作品中,“我”来到台北,依旧昨日。当“我”看到在一场游艺晚会中,演唱《东山一把青》的女歌手时,竟然发现这个当年一个痴情为爱的纯情女孩朱青,因为无法忍受爱情的失落,如今沉沦堕落为一个“分外妖娆的女人”,对于情人的死亡情绪毫无反应,竟然夜夜笙歌,“我”的震惊自然就会随着歌声扩散。

朱青演唱的《东山一把青》,原是来自民间的一首情歌,后来成为大陆的一首流行歌曲,由上海百乐门歌手白光演唱:“东山啊,一把青。西山啊,一把青。郎有心来姊有心,郎呀,咱俩儿好成亲哪——”从乡间民歌到城市流行曲的音乐风格流变,也正好与主人公朱青身份变化,形成一种有意味的类比,一首歌既是她的“爱而不得”的丧夫之痛,也点出了朱青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身份无奈的转变。由此看到,音乐一旦进入叙述空间中,它便成为一种命运的“情境符号”,当它再被还原到它被体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空间中,就可以看出作品中音乐与空间相互建构出的独特的意义世界。

上面小说中使用的歌,都为当时的流行歌,这些歌之所以流行,也正在于它是一种与特定文化语境相联系的社会性文本,因而带有强烈的历史标识性。因此,一旦被作家植入叙述语境,这些音乐符号意义便给人生以双重编码。音乐社会学家西蒙·弗里斯指出:“流行歌曲的本质是对话。”^①流行歌是人心与社会的对话,在小说中被“引用”后,它们在新语境中重构了与读者的对话关系,诉诸读者对社会文化及历史新的理解。

白先勇小说中另一首作为标题的小说《夜曲》,构思精巧。在小说中它是指肖邦的《降D大调夜曲》,是一首浪漫而抒情的钢琴曲。小说中的“我”对暗恋的姑娘吕方的记忆和这首音乐密不可分。多年重逢之际,在我独等她重逢见面时,我的记忆中萦绕着这首钢琴曲:靠窗的那架乌黑的钢琴上,一只宝蓝的花瓶里,高高地插着三朵白白的发亮的菊花。有人在弹琴,是一个穿着丁香紫衣裳,一头长长黑发的东方女郎,她的侧影正好嵌在晕黄的窗框里。肖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,汨汨地流到街上来,潺进了那柔熟的夜色里伫立在街边,一直听完了那首夜曲,心中竟漾起一阵异样的感动。

接着作者笔锋一转,写到这个姑娘真正喜欢的是肖邦的另一首“气势磅礴的《英雄波兰舞曲》”。男女主人公欣赏的音乐风格的错位,也暗示了两人不同的命运选择。实际上,当年自己暗恋的姑娘志存高远,“有志向,有胆识”,一心要“追随父志,学成后,回去推广音乐教育,用音乐去安慰中国人的心灵”。然而,吕芳回国后不仅和“我”失去联系,也遭遇了“文革”的种种不幸。爱国之心,并未能如愿实现,最后成为一个颓丧的中年妇人,回到纽约潦倒度日。选择肖邦的哪一首乐曲,就与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好发生了深刻关联,也就成为主人公命运之路的象征。在这里,

音乐如同音乐符号学家纳蒂埃所说,是一种被赋予意义的“迹象”,一旦找到这个“迹象”,声音符号的意义随之敞开,作品精妙的构思意图和象征隐喻也就显现。

二 音乐符号的身份标识

显然,要讨论白先勇的音乐之缘,不可能回避《游园惊梦》这篇被认为最能体现其思想和艺术特色的杰作。作者说道,“由于昆曲《游园惊梦》和传奇《牡丹亭》的激发,我便试图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两出戏的境界,这便是我最初写《游园惊梦》的动机。”^②昆曲作为一种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音乐形式,必然在白先勇的作品中承担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。

白先勇近十多年来,致力推广中国的昆曲文化,他认为:“昆曲是包括文学、戏剧等雅俗共赏的表演艺术形式,特别是昆曲的文学性,我们的民族魂里有诗的因素,昆曲用舞蹈、音乐将中国‘诗’的意境表现无遗,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里抒情、写意、象征、诗化特征的一种艺术。”^③小说将昆曲《游园惊梦》移植到叙述的每个环节中,与小说表现的主题、情节、人物、气氛连接成一片,这的确是作者“下了最大的功夫”,“整个写下来,最苦、最美的一篇”。

小说将昆曲这种“最精致完美的艺术形式”变成了小说文本展开的方式。主人公蓝田玉,一生的命运与演唱昆曲《游园惊梦》相联:她精妙地演唱一出《游园惊梦》赢得了钱将军的爱情,从而娶她为夫人。而让她惊异地发现自己爱恋的情人郑参谋与她亲妹妹的私情时,也恰好在南京的一场清唱聚会上,正在演唱《游园惊梦》时。急怒之下,顿失嗓音,而在窦夫人的宴会上唱《游园惊梦》时,不仅再次勾起她的各种回忆,而且再度失声,无法再唱“惊梦”。对她来说,梦已醒来,时光不返。

可以说,是音乐引导小说文本从一个历史时代,穿越到另一个历史时代,在两个已经整个儿翻转的社会空间之间布局。与其说汤显祖的《游园惊梦》在主人公的生命历程中逐步展开,还不如说,昆曲、昔日繁华、今日凄凉,与之巧妙地构成了一曲赋格式的复调,以主人公的情感和命运作为动机,相互追逐,时而对应,时而对立,这种复杂的对位关系,正好与作品深刻的主题对应。

昆曲作为一种音乐形式,成为主人公生活空间的一部分,也就成为主人公这一群体的身份标识,因而,昆曲也成了这一群人共享的一种文化符码。这一符码只要被某种社会文化所接受,它就是具有了身份价值,也就能在这种文化与社会中发挥其身份区隔功能。巴尔特说,“符号的意义取决于文化惯制”,一旦丧失这符号,也就意味着与此种文化惯制告别。

昆曲《游园惊梦》不仅成全了钱夫人一生的命运,同时它也像一个纽带一样,聚集了这一群共享这种艺术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精英。在这里,昆曲音乐就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,而是构成他们生活和文化记忆的重要仪式。当这一文化社群聚集在一起的时候,唱一首昆曲,就成为一

种身份规约化的“必要的重复”，同时也成为一种追回昔日时光的意义通道。

三 音乐对于性别跨界的意义

音乐作为身份文化符号的识别标志和社会意义，在白先勇的后期作品中更为明显。1983年的长篇《孽子》中，音乐因素增加，而2001年的《Danny Boy》和2003年的《Tea for Two》两篇小说中，音乐又再次回到以歌名为题的中心地位。显然，音乐可以成为再现同性之恋的复杂情绪和难以表现的文化立场。

《Danny Boy》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歌曲，白先勇将其转化为一个同性恋者对一个即将因艾滋病死去的，叫 Danny 男孩的爱恋。这首歌曲把小说和歌中故事联系在一起，其深意在于，音乐唱出的情感已经跨越各种身份，走向一种普世之爱。

白先勇笔下的交友圈，往往以同性恋酒吧为中心，在这里音乐与社会文化空间结合得最近。《孽子》中的“安乐乡”里面半盲的琴师杨三郎，也是日据时代的流行曲写手。但完全以音乐来贯穿是小说《Tea for Two》，这是首著名的同名歌曲，同时亦是坐落在纽约曼哈顿上的一家有名的男同酒吧的名字，这三重命名，意味深长。此歌中文也被翻译成《鸳鸯茶》。

音乐是同性恋酒吧文化的主导因素，各种音乐活动赋予这个社会空间以灵魂，使这个空间有了生命的丰盈。小说除了对这个酒吧的空间进行了详细描述外，还特别提到酒吧中有一台钢琴，现场演奏演唱的各种歌曲，这些不仅成为背景音乐，也成为这个空间中每个生命力的体现。歌者会根据客人的喜好，演唱不同的歌曲。其中《飞我上月球》《暗夜里的陌生人》《无法习惯失去你》，都是美国流行歌曲史上一些历久不衰的老歌。比如，主人公之一大伟引吭高歌了一曲《南太平洋》的主题歌《某个奇妙的晚上》。“我”为安弟唱一曲《我把心留在了旧金山》。整个音乐空间里充满了“老纽约的怀旧气氛”：“没有迪斯科，也没有硬摇滚……最多插几曲拉丁的恰恰和伦巴”。

而在整个空间中的人物主体，却来自不同的地域，不同的背景。“我”是华人，恋人安弟是中美混血儿，东尼是中国人，他的爱人大伟是犹太人，珍珠是台山妹，伴侣百合是德州人，费南度是菲律宾人，配偶金诺是意大利人，甚至连那个常客，“米开兰基诺的拿手戏是普契尼的《蝴蝶夫人》，欧美的名歌手他都导过了”，也是“那座两百多磅留着山羊胡的大肉山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名导演”。

虽然《Danny Boy》和《Tea for Two》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，都还是华人“纽约客”，但这个文化社会空间，“已不再是单纯的中国世界，而具有了世界化色彩”。^④他们所歌唱的“just you for me, just me for you”中的“你”和“我”，也已经成为一个个漂浮的能指，超越了种族、性别和文化的区隔。“Tea for Two”，成为一个理想的王国，正如小说中大伟和东尼留下的遗书中所写：“说不定在‘欢乐天国’里，我和东尼

把我们的 Tea for Two 重新开张起来，等着你们来大家一同喝酒、唱歌、跳舞。”

然而，小说中，当年的“欢乐”者，最终不是惨遭车祸，就是自杀身亡，几乎被艾滋病扫荡一空。“我”想把“撕裂的过去衔接起来”，结果发现现在已经全变了，粗俗邈远，“被销毁的连半点遗迹都寻找不到了”。最后，残剩的几个朋友用一曲“Tea for Two”送别朋友，不得不强忍泪水，怕正在走上天堂的朋友被我们的泪水拖累。此刻，天堂注定坠毁，昔日自以为天使般幸福的人物坠落到尘世，但“Tea for Two”作为一种曾经幸福的识别符号，架起了昔日和未来之间的希望之桥。

在这里，同性恋作为文化跨界行为，靠的是音乐的实践能力。此时的音乐空间，就与一定的文化历史结合在一起，成为列斐伏尔所说的“空间实践”，即由“空间呈现”和“呈现的空间”辩证地混合而成，构成了一种特殊认知世界和探索世界的方式，白先勇小说中的昔日美好时光，就具象为一种奇特的“音乐空间形象”，一个体验音乐的记忆不可能缺少这个形象，音乐被随时唤起，也只有音乐才能拼合起被剥夺了内容的历史。

白先勇小说建构的音乐空间非常丰富，正如詹姆斯·罗尔所论：“由于音乐容易获得并且富有‘弹性’，它可能是不同政治文化团体和运动表达的完美形式。”^⑤而音乐—空间本身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，它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化活动的产物，反过来，它又是一种深藏于人类记忆中的力量，使我们能抓住时光流逝留下的痕迹，明白任何宝贵的东西都是瞬间即逝，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，但音乐可以追回并重构历史记忆。

纵观白先勇写作历程，可以发现，当音乐体验这样的奇迹出现在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中时，音乐实际上已经从一种行为，一种记忆转变成一个具有历史意蕴的事件，乃至不断累加的意义象征，深埋在作品深处，随时唤醒读者的沉思。

注释：

① Frith, Simon, *Popular Music: Music and Society*, London: Routledge, 2004. p. 23.

② 白先勇：《白先勇文集》（第5卷），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36页。

③ 白先勇：《白先勇说昆曲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22页。

④ 刘俊：《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》，载《纽约客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161页。

⑤ [美]詹姆斯·罗尔：《媒介、传播、文化——一个全球性的途径》，董洪川译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，第204页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三峡学院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。本文为四川大学中央高校科研专项项目中期成果之一，项目编号：skqy201631）

责任编辑 刘小波